

朱德关于新中国工业化建设思想探析

侯发兵 余红梅 周亚玲 易新畅

摘要:朱德长期关注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在这一领域形成了一系列思想,主要包括强调尊重客观规律,结合实际开展工业建设;强调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同时注意引进和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强调处理好国家工业与地方工业间的关系;强调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紧密结合发展;高度重视工业生产的进展、质量和技术进步等方面。朱德关于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思想,对于今天我国的新型工业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关键词:朱德;工业化;军事工业;地方工业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00X(2022)05-0010-06

朱德一生关注中国的工业化建设问题。早在青少年时期,他就通过书籍和席聘三、吴绍伯等师友了解到当时机器大工业发展的一些情况并对此产生了浓厚兴趣。此后,在求学和探索救亡道路的过程中,朱德先后辗转成都、昆明、上海、柏林、莫斯科等地,对近现代中国和欧洲国家的工业化情况有了更多更深入的了解,意识到工业化是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状况的必由之路,并认为“中国需要产业革命”^①。新中国成立后,朱德深入实地调查研究、视察指导各地的工业化建设,在这一过程中发表的讲话及作出的指示等,形成了关于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思想。

一、强调尊重客观规律,从实际出发搞工业化建设

朱德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强调工业化建设要尊重客观规律,不能盲目开展建设。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国民经济经过恢复,工业生产在“一五”计划期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随着急躁冒进思想的抬头,特别是各种违背客观规律的做法,给发展工业化经济建设造成了损失。对此,朱德在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的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发言指出,“要把大家的积极性引导到农业,工业,手工业生产上去……但不能用那种几十万,几百万人齐上阵的办法,不能那样搞,而是要有组织,有计划地

收稿日期:2022-07-27

作者简介:侯发兵,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余红梅,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周亚玲,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易新畅,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本科生。

① [美]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陶宜,徐复,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109页。

搞”^①。这实际上批判了脱离实际盲目冒进的做法,强调包括工业生产在内的各种建设必须尊重客观规律。

此后,朱德又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推进工业生产的重要性。比如,1962年6月,朱德在云南个旧视察云南锡业公司时,要求红河州负责人在锡矿开发过程中重视科学研究工作,强调只有尊重科学规律才能把矿山建设好、管理好、经营好^②。又如,1963年10月15日,朱德专门致信周恩来和邓小平,指出由于煤炭价格较低,使得大部分煤炭生产企业处于亏本状态,进而影响到了煤炭的产量和质量。对此,朱德指出,“怎样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这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应当组织一些人,切实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③。

正是从尊重客观规律的思想出发,朱德反复强调在我国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情况下搞工业化建设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必须从实际出发。例如,鉴于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的国情,朱德勉励全国化学工业领域的工作者“先把旧厂恢复起来,然后再加以扩大”^④。这种立足客观实际进行工业化建设的理念,反映了朱德尊重规律、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态度。同时,针对一些不切实际的做法,如内蒙古包头钢铁厂建设过程的过分求新、求大、求多的问题,朱德提出了严肃批评,指出:“不能犯贪新、贪大、贪多的毛病……只能根据主客观条件,根据需要

和可能来决定我们的工作方针……脑子太热了,跑得太快了,结果会事与愿违。”^⑤此外,针对类似的问题,朱德总结了教训,特别强调“计划应当从实际出发,能做到的就去做……而对做不到的就不做,应分清主次缓急”^⑥。

二、强调坚持自力更生,同时注重引进技术和人才以及借鉴国际经验

新中国的成立,为我国实现工业化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⑦。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学习和借鉴了苏联工业化建设的经验,但始终强调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朱德在有关讲话中反复强调要坚持这一方针。比如,在1949年12月召开的全国重工业会议上,朱德指出:“搞建设主要靠自己,不是靠外援。不是不要外援,而是要把自力更生看做是主要的。”^⑧国营绵阳缫丝厂是“一五”期间全国重点建设工程之一,也是我国第一个使用自动缫丝机的工厂,为我国缫丝工业由手工操作向自动化、现代化方向转化迈出了第一步^⑨。1957年3月,当朱德在视察该厂看到所用缫丝机是日本产品时,勉励有关人员说:“外国的先进技术我们要学,但主要是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⑩此外,朱德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要注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人才,借鉴国外经验。比如,在1951年的全国钢铁质量会议讲话中指出,要把我国的钢铁工业向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朱德自述》,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第274页。

② 孔祥庚,杨杨:《朱德与云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59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885-1886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365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505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627页。

⑦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第85页。

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359页。

⑨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奋进历程 辉煌巨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四川要事辑录》(2022年2月8日),<https://www.qqx.com/gonglve/139517877446246400>。

⑩ 张继禄,周锐京:《朱德与四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0页。

前进一步推进就要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①。又如,1954年8月,朱德在河北视察山海关桥梁厂生产武汉长江大桥钢梁的情况,当他听到苏联专家传授的“机器样板法”工艺比原来的“局部放样法”工艺精确几倍时说:“咱们国家工业水平比苏联差,应该好好向专家学习”^②。

在争取和接受外援的过程中,当时某些部门和同志存在一定顾虑。对此,朱德进行了细致耐心的阐释,说明接受外援的意义,强调不能将自力更生和外来援助对立起来。他在听取重工业部副部长何长工汇报时指出,“目前争取苏联的帮助是可以的……我们有些同志怕与他们建立联系,结果闭关自守,吃了亏。”^③同时,朱德针对那种盲目排斥外来援助的思想进行了批评,指出“不接受外援的思想是不对的”“一定要加强国际合作,内外协作是永久性的”^④。朱德的这些讲话辩证地阐明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来援助的关系。

当然,朱德在强调引进先进技术和人才以及借鉴国际经验时,始终把落脚点放在提升我国科技水平、培育我国科技人才以及加快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上。国家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朱德曾专门致函周恩来,明确提出“为加速我国工业化的建设,必须大量从苏联进口设备……在大量聘请苏联专家的同时,抓紧培养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⑤。1955年12月到1956年3月,朱德率代表团先后访问罗马尼亚、民主德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苏联和蒙古等国。访问期间,朱德慰问了在这些国家学习的留

学生,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先进科学技术。

虽然朱德强调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人才以及注重借鉴国际经验,但他并不迷信国外的设备、经验和做法。比如,他在1957年3月视察云南昆明跑马山拖拉机站时指出:“外国的机械,有的是好东西,对我们的建设有帮助。但对我们是否适用,就靠你们今后在实践中去检验了”^⑥。又如,在1957年4月17日同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谈话时专门谈到了苏联的工业管理体制问题,指出当时苏联“也正在改变这种管理体制”^⑦。总之,朱德认为引进国外的设备以及学习借鉴国外的管理体制和经验等,必须结合我国实际,而不能简单地拿来就用、照搬照抄。

三、强调处理好国家工业和地方工业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提出要注意理顺工业化建设过程中的各种关系,如宏观层面的工农业协调、轻重工业平衡、兼顾积累与消费等关系,微观层面的工人福利改善与生产增长、生产管理制度的继承与变革等关系。其中,他着重强调要处理好国家工业与地方工业的关系。

地方工业是国家工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德特别阐释了地方工业与国家工业共同发展的重要意义,指出:“发展大规模的国营工业又必须与发展地方型的公营工业结合起来,使每个省、每个大中城市和许多专区的工业沸腾起来……如果我们不对地方工业加以支持,就不能广泛地调动建设的主动性”^⑧。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403-1404页。

②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朱德与河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第249-251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426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648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441-1442页。

⑥ 董杨:《“彩云永是现滇南”——朱德的云南情》,《党史博览》2017年第12期。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598-1599页。

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441页。

正是基于对地方工业重要性的深刻认识,朱德对各地工业发展十分关注。以当时四川省燃气化工产业发展为例,朱德不仅专门听取石油工业部副部长李人俊、化学工业部副部长李苏等汇报有关情况,还多次视察和了解重庆、隆昌、泸州等地的天然气开采和综合利用情况。为了解决四川天然气资源勘探和开发无法满足工业发展需要的问题,他提出“必须加强这方面的研究设计工作,对于在研究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应当及时地加以解决,从人力、物力上给以必要的保证”^①。

随着工业化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国工业领域取得了较大进步,但同时一些体制机制弊病也凸显出来。比如,对于工业管理体制上倾向于把不少工业领域收归中央层面作为国家工业进行管理的问题,朱德进行了严谨分析,并指出了其弊病和进行改革的必要,认为,“我们的工业管理体制,不是统一领导、分散经营,而是把什么都统到中央来,这是实行不通的,必须改变”^②。同时,朱德分析了不能将所有工业领域都作为国家工业统制起来的原因“因为国家统制各项费用太多……要把下面的情况摸透,否则,计划制订出来也执行不通,因为对下面的情况不了解”^③“什么都由国家包起来,看上去是好事,实际上根本做不到”^④朱德的这些讲话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提出了体制上要理顺关系才能进一步促进工业生产的思想。

关于如何发展地方工业的问题,朱德强调要给予地方一定的自主管理权限,不能有过多

的限制。他在1955年10月8日和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等人谈话时强调,“地方工业也不要限死,必须部办的企业,归中央……其他归地方,不上交利润,只须报中央备案,这样可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创造性”^⑤。

总体而言,在处理国家工业和地方工业关系的问题上,朱德强调除重大的关键性的骨干项目必须以中央为主管理外,将中小型企业、轻工业划归地方经营,同时各地也只有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发展地方工业,才能增强活力进而加速经济发展^⑥。比如,朱德在1957年4月18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特别谈到,“中央对地方的机械工业不宜统得太死,不要把稍微像样的机械厂都收归中央管理……应给每个省下放个把像样的机械制造厂”^⑦。又如,在1957年9月4日和建筑工程部部长刘秀峰谈话时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应该把建筑事业交给地方去管……一小部分大型建筑工程由中央指导帮助。这样既能做到统一管理,又能根据当地的不同条件建设不同风格的建筑,不是一个模式,生搬硬套。”^⑧

四、强调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紧密结合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严峻的国际环境尤其是抗美援朝使我国发展军事工业的任务十分迫切,在此背景下,朱德对发展军事工业以巩固国防安全有诸多论述,重点阐述了军事工业建设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朱德调查研究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40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598-1599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620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736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513-1514页。

⑥ 鲁杰:《元帅痴情强国梦——朱德与新中国》,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0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朱德调查研究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44-145页。

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624页。

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比如,他在1952年7月8日的全国军工会议上发出号召:“军工建设是艰巨的,时间是紧迫的……我们今天的设备、技术与国防需要还相差太远,所以希望同志们努力工作,发展军事工业。”^①

随着我国国防实力的不断提升和国际环境日趋稳定,朱德更多地强调将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紧密结合以促进共同发展。1956年5月29日,他专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反映在山西省视察了解到的情况并提出,“把军事工厂和民用工厂的生产如何有效地紧密地结合起来配合生产,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件事”^②。不仅如此,朱德十分重视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脱节造成的问题。比如,1957年3月19日,他在视察重庆一零一厂、一零二厂后致电中共中央指出:“重庆各军工厂的生产任务不足,人员、设备浪费很大……将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军工厂转民用生产或军工厂生产与民用生产相结合的问题,是迟早非解决不可的。”^③同年4月18日,朱德在外出视察后再次就这一问题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报告,指出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没有很好结合起来发展的在当时具有相当普遍性。针对这一全国性问题,朱德分析了兵工厂具有的“投资大、厂房好、职工多、设备新、技术水平高、生产能力大”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就其产能过剩的情况提出“兵工生产在和平时期兼产一些民用物品或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问题,迟早非解决不可”^④。

朱德关于将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紧密结合

起来发展的思想,与其对国际形势变化的敏锐判断和科学认识有着密切关系。1956年4月25日,他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需要考虑怎样把最大的力量集中到和平生产方面,同时把国防建设同和平生产结合起来的问题”^⑤。此后,他在其他一些场合也谈到了类似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德进一步深化了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尤其是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后,他更加明确地指出,“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应把军工和民用工业结合起来……有条件的话,多生产些民用产品”^⑥。

五、重视工业生产进展、质量和技术进步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我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目标任务以及当时我国工业十分落后的客观现实,朱德在各种讲话、指示、函电、报告等中多次提到如何加快推进工业生产的问题。比如,1949年11月2日在和燃料工业部煤矿系统负责干部谈话时强调,“一方面要把原有的煤炭生产恢复起来,同时还要进一步建立起新式的有现代化设备的煤炭工业”^⑦。

针对工业生产的一些重点领域和重大工程,如玻璃纤维工业的发展和石景山钢铁厂的扩建等,朱德特别留意其具体开展情况和实施细节。1957年11月,朱德致信中共中央,就发展玻璃纤维工业提出建议,认为当时建材部党组提出的请苏联设计一个总投资约为一亿元的大型玻璃纤维工厂及供应设备的建议是可行的,并指出这“可以为我国的玻璃纤维工业树立起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431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朱德调查研究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94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957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朱德自述》,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第265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546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980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355页。

一个重要的骨干”^①。1959年5月22日,朱德致函邓小平并转中共中央,反映石景山钢铁厂扩建问题。针对该厂有没有可能建成一个大型钢铁基地的问题,朱德在认真分析了场地、原材料、交通、技术力量等方面的条件的基础上,建议有关部门注意和支持石景山钢铁厂的扩建计划^②。

同时,朱德特别重视我国工业生产的质量问题。1956年5月24日,他在和黄敬谈话时就学习借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验指出:“东德的蔡斯工厂技术很高,产品都是经过严格的自动检验的。宁愿废品多一些,也不愿损害自己的名誉……我们也应该重视这个问题。”^③此后,朱德在视察各地工业生产情况时反复强调质量问题。比如,1958年9月27日在视察太原钢铁厂时指出:“工业生产不能光强调数量,还要注意产品的品种和质量。”^④在1961年和1964年两次视察华北制药厂时,反复提到“一要搞好产品质量,创世界名牌”^⑤,认为“提高质量是个大问题;质量不好光便宜不行,质量好了又便宜才好”^⑥。

此外,朱德还特别重视工业生产的技术进步问题。比如,1956年10月18日,他在视察北

京七一八厂时,专门题词“掌握现代技术,赶上国际水平”,勉励其不断提升技术水平^⑦。又如,1961年5月2日,朱德在陕西宝鸡视察二一二仪表厂。当了解到该厂在技术革新中研制成“一刀多刃”和“多头钻”等技术时,他对有关人员给予高度评价,称赞他们在困难时期攻坚克难,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出“尖端产品”^⑧。此外,朱德还在其他不同场合强调要加强科学研究和进行技术革命,以此推动国家工业化建设。

综上所述可见,朱德关于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思想源于实际,也应用于实际^⑨,它鲜明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迈进过程中的现实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工业生产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工业化任务远未完成,尤其是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赋予工业化新的内容的新形势下,如何实现新型工业化仍然是我国面临的极具挑战性的任务。虽然今天我国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的内外环境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朱德强调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坚持自力更生的思想,对于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636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725-1726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550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697页。

⑤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朱德与河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第327页。

⑥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朱德与河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第329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562页。

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804页。

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新中国60年研究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500页。